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he Discourses of Daily Life : The Muslim People' s Rebellion in Shaanxi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4-12-1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田村, 和彦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2363

从生活话语来看的“历史”记忆 ——以陕西同治回民起义为例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he Discourses of Daily Life: The Muslim People's Rebellion in Shaanxi during the Tongzhi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田村 和彦

TAMURA Kazuhiko

In this paper, I analyze express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Muslim people's rebellion in China, Shaanxi.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often focus on the processes and motives of the rebellion, but through a reform of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se descriptions,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 of this rebellion, was radically changed by historian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taken no notice of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who reside in the rebellion's location. This paper, with the aid of a *social memory* study, tries to describe the rebellion from the people's view through oral history, social memories, and expressions that are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From this study, I point out several problems regarding the study of written records and present an argument for considering historical phenomenon from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1. 问题的提起和本文的目的
2. 作为事件史的回民起义：在关中地区进行的访谈
3. 隐藏在生活中的回民起义的记忆
4. 结语

1. 问题的提起和本文的目的

有关十九世纪发生的回民起义，以历史学为中心已经有了很多详细的研究。在日本，早期的中田等人的研究早已对这段历史的性质、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总体性的把握（中田：1959、1993）。近年来，有关封建时代的起义、造反的研究大为减少，但是作为少数民族研究的一环，同时，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包括陕西省在内的各地回民起义的研究也还是有很多的积累。

笔者在陕西省关中平原的农村就农民生活曾经进行了一年半的“三同式”田野调查。笔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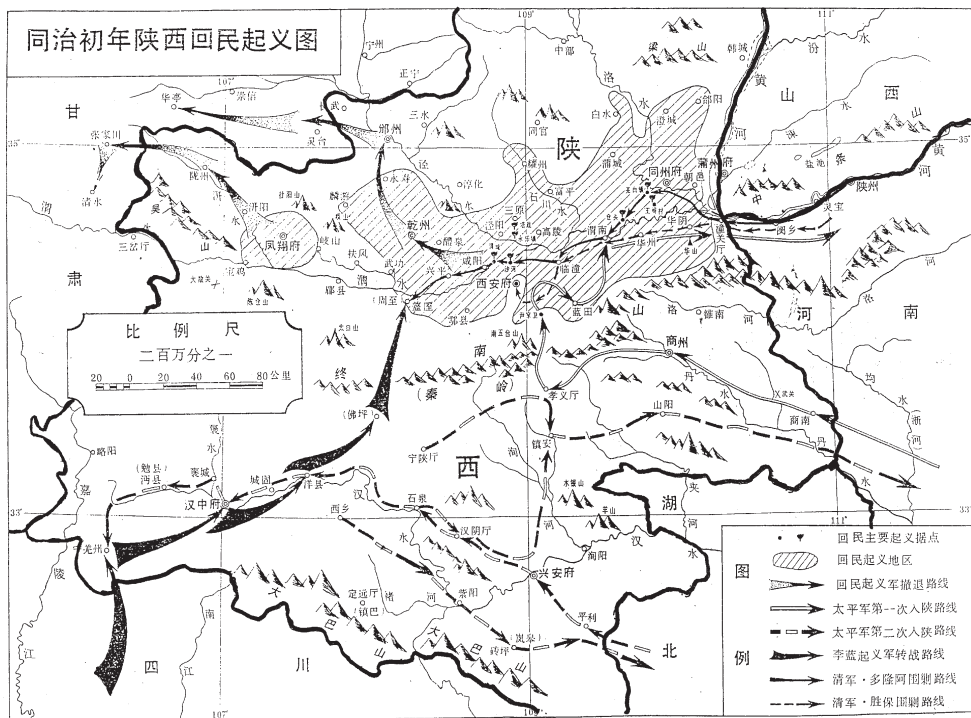


图1 同治陕西回民起义范围
(邵宏谟, 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1992),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住的农村, 恰好位于当年回民起义的据点之一的渭城府的周边区域(图1, 照片1)。因此, 有机会收集到当地居民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同时, 为了再考察地方历史而进行的文献调查中, 笔者也收集了回民起义的相关文字资料。其中一部分的资料, 已经在有关记录地方社会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手法的变迁的论文中作了发表¹⁾(田村: 2007)。

从文字记录的史料和民间的口承故事两方面考察这段历史的结果是, 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一般来说或是对将军·兵士的英勇善战、战斗的场面进行总体概述, 或是对回民军带来的被害情况以及社会的凋敝进行描述, 也就是说, 是从地方社会秩序的观点为核心进行记述的。县志、乡土记的记述无需赘言, 《续修陕西通志稿》之类的通志中, 在“忠节”、“殉难”、“烈女”、“孝女”等章节中回民起义有关的人物也频繁出现, 即使是对陕西省中部情况进行的一般性解说中, 也出现了有关回民起义给当地社会带来的毁灭性破坏情况的描述(党: 1931)。

与其相对, 范文澜、白寿彝等人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回民起义》则从革命史这一历史认识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定位, 将其回归为更为大局性的国家历史系列之中。他们重新考察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 将此放在更大的理解结构上, 指出发生于同治元年的这一事件, 是回民这一民族为了生存进行的武力斗争、以民族为基础的反封建斗争。以往被称为“回回之乱”、“回变”的这一事件也由此被定位为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起义”²⁾。



照片1 现在的“渭城府”附近外景 2001年田村和彦摄于陕西省咸阳东郊

因此，现在的地方志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述，体现了这一大局性的历史观点所揭示的认识框架，即回民起义其实是狡猾的封建清王朝（主体是满族）“以汉抑回”的离间之计的结果。杨文治、白彦虎被视为英雄，以汉回对立为焦点进行了激进的历史记叙。汉人的被害情况从记述中消失，曾经被置于社会劣势地位的回民从起义的发起、经过、意义以及镇压回民起义的清军、与清军一起绞杀回民军的地方团练的残酷性成为记述中心。可以看出，与范文澜、白寿彝等人的历史认识相比，今天的这些地方志的记述好像似乎以更为单纯化的结构来理解这段历史。另一方面，近年编撰的地方志及相关研究对事件的各种数据的记述（时间、人数等）更为明确，地名、人名等固有名词在记述中也有所增加，似乎在不断走向“科学化”。但是，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科学化”没有明确根据的事例也非少见，因此，与其说是研究的深化，不如说迎合了从大局看的历史主体发生了急速变化的这一潮流，与曾经是回民起义的舞台的地方社会居民的历史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偏差。

这便成为研究当地回民起义这段历史时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当地人如何认识作为自己的历史的这一事件，有必要从“老百姓的世界”³⁾的角度来探讨今天的当地居民的回民起义的印象问题。在最近几年编纂的西安周边农村的大多数“村史”中，回民起义都在村的《历史纪略》、《苦难岁月》中被作为重点记述、提及，可以说对当地人来说这是重大的历史事件⁴⁾。在笔者的调查地，关于回民起义，很多人都共有着相似的“口承故事”。正如下文将提及的，这些故事与当地居民的婚姻规则、居住、村中的特定场所等连接在一起，对村民的日常世界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本论文所关注的回民起义可以说是“活着的历史”。

为了展示这一“活着的（流传下来的）历史”，有必要对与事件相关的这些口承故事进行收集、积累、对比，由于资料的性质的制约，本论文的目的并非对过去发生的这一事件进行再构建，而是关注它是如何被人们记忆的。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其说是对历史进行再构建，不如将其归纳为口述史这一范畴。这种方法虽然是对从传说、故事着手，但不能因此就说与将文字资料作为对象的研究相比，必然缺乏可信性，或者说由于内容不够准确，因此就不值得引以为证。因为“后现代

派”的有些历史学者指出，即使在历史学科内部对于口述资料的使用问题也出现了变化（Jenkins:1991等）。同时，对本论文来说，更重要的理由是当地有关回民起义的口承故事有着比较固定的内容，与1949年以前的文献资料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不过，与1980年以后编撰的地方志相通的内容却比较少。也就是说，时代的需要（潮流）对有关历史事件的记述方法有着很大影响。与成为文本 text 固定化的正史、实录等史料相比，在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地方志的记述方法中这一迎合时代需要记述历史的倾向显得更为明显。当然，也不能因为现在流传的口承故事、人们的记忆与1949年以前记录的文献资料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并不能认定这些就是事实。就回民起义这一事件来说，“基于革命的要求，对它的历史认识进行了再构建”（并木：1994（2010））。可以看出，与口承的历史相比，回民起义被定位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有意义的大事件后，文献上记述的内容有了更大的变化。

基于上述情况，本论文在构成上首先将列举周边村落中存在的作为历史事件的回民起义的相关故事。正如社会学、人类学有关记忆与口承故事研究中曾指出的，人们共有的记忆在与景观、物质文化的关系中被稳定化（Misztal:2003）。本文将以此观点为根基，分析以隐藏在日常生活形式中的有关回民起义的口承故事⁵⁾。这里所说的口承故事，是一种记忆的表现机会，而“记忆”则是“对发生于过去的事件、经验进行铭记、保持，并具有以某种方式再次想起的机能（作为过程的记忆）、以及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形成的对过去的认识方式及其总体（作为存在的记忆）”（岩本：2003）。在这一层次上，“对赋予人们目前生存方式以意义的源泉的过去进行再思考”的记忆和口承故事有着深层的关系。通过本文的考察，笔者试图探索“过去是如何被记忆（记铭）、如何被赋予意义（保持）、又是如何被叙说的（想起）”。也就是说，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回民起义这一历史事象的相关记忆，对当地人们的生活世界进行再思考⁶⁾。

2. 作为事件史的回民起义：在关中地区进行的访谈

本节参照的作为事件史的回民起义，是以笔者就回民起义进行的对话式的调查中获得口承故事的概要为主⁷⁾。从这一角度来说，与下一节将考察的当地居民们作为过去的重大事件而记住的，与村内的景观·事物连接在一起的、片断性的，好像是“来源谈”式谈及的回民起义在形式上有所不同。

事例①

（回民起义刚开始时）最初好像有去了渭南的回民。当时还是规模很小，绝大多数的回民村还是与以前一样。然后，据说从西安方向来的回民集团在村里来来往往，这附近的回民村的男人也聚集起来与民团打了起来。这一年，雨水稀少，庄稼收成很不好。暴乱总是在这样的年辰爆发吧。

事例②

几个回民村的回民聚集起来开始暴乱。他们刚开始屠杀其他村民时，文人绅士杨某率领民团进行了抵抗。但是很快就败退了，民团离散，各自逃回家，杨某也被杀害了。（反抗回民军的人，笔者补充）其他也有。这就是民团的领头、这附近村落的男人。特别有力气，也有着很高的人望，但是被杀害了。之后，他的妻子也由于不服从回民军而被搜出杀害了。

事例③

回民村将呼应西安府来的回民军的消息传来后，宗族的老人们聚集在庙里商议对策。结果决定请善于占卜的人预测今后的事态。被请来的村外的男性占卜师，在村民的面前在筛子的一段捆上毛笔进行占卜，最后在白纸上写出来的文字是“要得回回没除非将军多”的启示。占卜师补充解释说，“讨伐军中肯定有很多将军”。因此，村人决定八旗军到来之前先躲藏起来。后来清军终于赶到了，在他们当中虽然将军不多，但是姓姜的兵士很多。占卜的结果虽然不准确，但也难说是没中。

这里列举的相关传说，在回民起义时曾经是回民势力的基地之一的“渭城府”周边的农村中，都是广为人知的普通说法。这些说法与事件发生后早期的文字资料相比，可以说在团练的头目和将军的名字、事件的时期等固有性方面有所缺欠。然而，越是文字记录多的事件，与村民们的口承故事的一致性也越高。比如说，事件②的民团领头人杨某，根据《县志·殉难》大致可以推测是举人杨培；而后者根据其出身地与经历，以及妻子被杀害等情况，可以推测是张福寅。现在的村中居民基本上不知道文字记载的回民起义的相关资料，也就是说流传下来的这些故事与县志之间不存在交流关系。可以说，这些性质不同的资料，在不同的条件下，也还是在记忆的选择中记住了同一事例。

3. 隐藏在生活中的回民起义的记忆

与上一节列举的回民起义相关的口承故事相比，当地村落中还存在着与人们当今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在说明情况、解释原因时经常被言及的回民起义。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对不可以通婚的村落或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不可以挖地窑的场所，解放前富起来的家族，来自不同地方的集团移民而形成的村落等进行说明的故事中。这些传说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相关问题时才被提及。因此，专门就“事件”进行采访调查可能不容易显示出来，而且传说大多是片断的。不过，其地域的固有性很高，被提及的机会也就很多，所以作为对当今村民的生活世界的规则形成有着一定影响的历史记忆，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例④

有一个大宗族由于其居住地面临街道，曾屡次受到来来往往的回民军的袭击。最后，

宗族的老人聚集商谈后，决定向回民军降服。以自然村为单位降服的白布挂在兼具村落入口和祠堂的庙里。结果是，该村成为回民军的休息地，并担任了为回民军供给食粮的工作。清军来到后，回民军失势，由于村民害怕周围村落的报复，该村的部分村民与回民军一起向西北方向迁徙。

他们是回民军的帮凶，由于与回民不通婚，因此，女孩子也不可以嫁给这个村的男性。

诸如事例④这类的口头故事是没有机会被记录或被采用到1949年以前的县志、乡土志以及近年来的地方志中的故事类型里的。原因是，旧社会形成的文字记录中，例如，曾经卖过药的农民在被掠夺的米中掺入砒霜，事件暴露后，父子俩人都被杀害并被斩断四肢之类的故事，由于其体现了对封建体制的“忠”，因此得到表彰，并被作为事实以文字形式被记录下来（张：1907）。近年来编纂的地方志则正如上文论及的，为了从民族对立的角度记述回民起义，摇摆于两者之间的人物事件也不能成为记录的对象。结果是在这两种历史记述中，以文字对发生的事件进行固定化的过程中，这类事件都被遗漏于记录事实的历史学之网的网眼下。

事例⑤

回民军来时，就躲到隐藏了入口处又窄小又弯曲的地窖（地窖）中。回民军如果发现了入口，就会将辣椒和杂草混杂的东西放在入口处焚烧，将逃进地窖的人熏死。也发生过向地窖内投入点了火的枯草的事。回民军被镇压时，这个村子只剩下17户人家。

事例⑥

回民军最初出现时，在途中遇到男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当场屠杀。但是他们没有屠杀女性。初期时被回民军屠杀的女性只限于反抗回民军的人。这样，活下来的人就给男孩子穿上女装、戴上女性装饰。这曾经管用一段时间，但是不久后，回民军开始不分男女、甚至躲藏起来的人也一律屠杀，人们开始夜里出逃。之后，回民军与清军开始激战。回民军不再出现后，人们白天也从地窖中出来，夜里也敢点灯了。

目前，在该地区有关回民起义的流传中最为广泛的就是这些与“地窖”“地窖”相关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之后，通常会加上某家的隔壁、哪里的西侧等具体场所就是那样的地方（照片2）。在挖新窑洞时挖出了大量的人骨的故事，或者由于死者崇拜而对在这些场所死去的人物的故事不断被传说着。像这样在“地窖”“地窖”中避难的行为并不仅限于回民起义时，例如在土匪和捻军等打来时，躲藏到地窖里避难也是在当地比较常见的行为。1949年以后，这一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治安趋于稳定，“地窖”便成了没有用处的存在。现在当年的地窖仍有不少保留下来。可能正是由于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像地窖这样具有物质性的根据还残留着，因此，有关回民起义的传说也就因此被不断地反复叙述吧。值得深思的是，据说是回民军曾传唱的有关地窖的歌在很多村落中流传下来，同样的说法在1949年以前的资料以及口传故事的珍贵资料中也有记载（张：



照片2 过去具有“地窖”的土窑 2000年田村和彦摄于陕西省咸阳东郊

1936等)⁸⁾。这些内容在现在的地方志中没有出现，但是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文字资料 and 将口述故事文字化的资料以及在今天村落中流传下来的口承故事中，却有着一致性的说法。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列举其他事例之后，再作进一步讨论。

事例⑦

经营高利贷的男性在起义刚开始的阶段就被惨杀了。这个男人曾向几个回民男性要求比一般更高的利息，因此成为怨恨的对象。附近的回民领着带武器的回民军闯进了高利贷者的家，将男主人推出来，用铁钩挂着他的下巴把他吊起来，勾破了他的喉咙。这与屠宰猪时用的方法一样，也就是说“像猪一样”地被惨杀了。他的妻子目睹了这一情景之后，疯了似的跑走了，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以上是村落内部流传的对某富裕家庭如何被毁灭的解说。比起将回民起义看作为一起突发性事件，将回民起义定位于所谓的“汉回杂居”的陕西省中部的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上的解释更为引人深思。

事例⑧

回民起义被镇压后，移住到这里的人中有一个没有双亲的孩子⁹⁾。他住的窑洞上面有一个土坟头，因为和自己父母的墓地连在一起，所以他常常也为那个坟除除草、打扫打扫。有一天，一个穿戴很好的妇女和随从一起来了，向少年打听这是谁的墓地。少年说，不知道是谁的墓地，但是既然在这里，就一直打扫了。老妇人又问少年住在什么地方，少年指了指自己居住的倒塌了的隐蔽窑洞。老妇人很吃惊地说，“这肯定是什么缘份吧”，并马上走到密窑中，开始在窑的最里面挖土，从里面挖出了很多钱。老妇人说，“这里原本是我们

居住的地方，那个坟墓是我丈夫的坟。当年我们回民被追赶，逃走的时候把财产藏在了这个地方。现在年纪也大了，越来越担心起来，今天就回来了。这些钱都给你，今后你就给我丈夫守坟吧”。

这个少年就是今天的某家族的祖先，解放前，曾经是富裕的财东。

与事例⑦不同的是，从事例⑧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用回民起义这一大事件的结果，来说明某个家族获得巨大财富的过程。在讲这类故事时，故事的叙述者们通常会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加上这样的注，对故事的真实性有所保留。根据日本民俗学的定义，前面七个事例的口承故事都是作为事实被叙述的“闲话”，而事例⑧则属于“民间传说”。重要之处在于正是在这些众多的故事传说的反反复复地对相关事件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回民起义被逐渐定位的。与此类似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并传承下来的理由是，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地方社会极为不安定。此外，在生产方面出现了由于栽种洋棉花和鸦片等而成为暴发户的家庭，对于一直以来以小规模自耕农业为中心的关中平原的村落（秦、苏：1996、秦：1999、2001）来说，有必要提出对此种富裕的不均衡性进行说明的模式也是社会原因之一。在这里，可以用弗斯特（George M. Foster）所提出的农民社会的“利益有限的概念”（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做相近的说明¹⁰⁾。

这一事例体现出来的另一个重要之点是，回民和汉人并非必然作为对立的关系被描述。事实上，被称为“回汉杂居”的这一地区，直至同治年间起义发生之前，以及后来回民从甘肃省等地再次回来，从河南省方向新的回民移住到这里，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民国以后也是同样，回民在乡镇的市场经营草绳店等等、从事手工业是一般的普遍情况，不过像过去那样形成回民村的情况基本上没出现（华源实业调查团：1933）。

总而言之，回民起义并非像今天的历史所描述的那样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无法回避的对立冲突的结果。由于汉人和回民长期在同一地区一起生活，因此，体现出更为现实、相互间比较和缓关系的口头传承也并不少见。最后，列举两个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事例⑨

（一边举出具体的近邻的村名，一边如下地叙述）虽然是回民村，汉族人也住在一起。虽然也有羊吃了草、孩子吵架等等。这在汉族人之间也会发生。我们也知道与回民结为义兄弟（回民之乱）时得到帮助的人（准确地说是曾得到回民帮助的人的子孙吧）。

过分地强调“民族”矛盾在起义发生原因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忽视村民中口头流传的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回汉双方在生活上的关系性。换句话说，在文字资料记录的故事中表现出来的回民起义是由于民族不同而不可避免的事件，可能会让我们忽视诸如事例⑨所显示出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另一面。

事例⑩

某村的某人年幼时被回民军抓住，成了俘虏，被带到了甘肃。到了中年后回到了村里。

村中已经没有熟悉的人，于是他与有同样遭遇的、返回村里的姓郭的男性结为义兄弟，放弃了回民生活。

事例⑨说明，虽然保持了民族的范畴，在不同的标签下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进行了修改和维持。事例⑩则说明，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民族范畴也发生了动摇的故事。虽然类似的故事流传下来的不多，但是在过去的渭城府一带也有几个被确认的事例。无须赘言，由于基于信仰的严格戒律，回民与汉人被分隔。但是即使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例。因此笔者认为对回民起义这样的历史事件，仅仅从民族范畴基准来分析问题的做法有欠妥当，有必要对这一带着有色眼镜的看问题方法进行反思。同时，上述的事例也表明当地人认识和分类“人”的方法，比学者们的意识更有流动性和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笔者与 Shinjilt 对“民族”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他批判了“简单地采用纷争、运动等过于宏观性的看法”，为了理解当事人所想及所用的“民族”，他在重要的民族志中很详细地叙述了人们使用“民族”一词时的具体情况、背景和范围等（シンジルト Shinjilt:2003）。

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本事例在内的本文列举的大多事例，都以极为相似的表现形式收录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的文献中（马（主编）：1993）。这是一部从马长寿等人从1956年到1957年记录了当地居民的口头传说和村民的历史记忆，并将其文字化的珍贵文献。历史学者通常认为，基于口头叙述形成的历史故事比起被文字固定化的历史资料在稳定性方面有欠缺。而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历史调查之一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中却记载了、被文字化的口承故事与今天很多村人的记忆有着相同的基调。这种相似性既可以佐证当年进行的调查的坚实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地口传故事的稳定性。近年来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进行口头传承的场所不断缩小，外出打工等带来的家族分散，从窑洞搬迁到公路附近的平房等等，带来了历史事件的口承故事逐渐走向消灭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马长寿等人的调查记录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总之，当地居民有关回民起义的口承故事，填补了1949年以前的地方志和今天编纂的地方志的空白，作为描写老百姓的资料，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文字化了的历史记述的界限性问题。同时，口头传承的故事对理解当地的各种“客家村”地名来源（咸阳市地名工作办公室：1987）、人口减少与移民（田：2000）、解放时小规模农村家庭经营很多的原因以及基督教的流入情况（冯：1964）等等都有着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口头传承的故事的存在还起到了连接回民起义研究和当地各个方面研究的积极作用。

4. 结语

本文围绕了同治年间发生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回民起义，以当地人们的口承故事为资料，对历史事件的事实（reality）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无论是以封建社会的忠节为基轴的历史再构建（从对当地社会的秩序破坏角度看待这一事件），还是今天的地方志所体现出来的从宏观的民族对立

的视角定位回民起义（着重描写回民军的积极活动），都与今天当地居民的口头传承中所显示的对这一事件的定位有所不同。

最后，笔者回到“集体记忆”和口述行为，试图参照社会学有关叙述 narrative 的研究成果，对当地居民的这些口承故事作一再定位。

研究意大利的劳工运动的 A. Portelli 提出将人们的叙述 narrative 分为三种模式，任何一个叙述都以其中的某一种模式被叙述着（Portelli: 1991）。受了这一理论模式影响的日本社会学者桜井厚指出这一叙述故事的模式可以用表来表示（表 1）。这是叙述个人经验时的模式，本文所列举的有关回民起义的口承故事的叙述者年龄最长的老人也是出生于光绪年间，也就是说他们叙说的都不是个人的亲身经验。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直接地引用社会学分支的 Oral History 或者 Oral Story 的相关研究方法。但是在这些模式的反复活动中可以形成一般性的口传故事的观点却是很重要的。

如果根据这一模式所揭示的观点，来整理本文中列举的有关回民起义的事例，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各个事例都有各自的变形 Variant，在个人模式和集体性模式的往复活动中被叙述着。有时正如事例⑥那样，真伪不能分辨的传说也在不断被叙述、口头传承的过程中，被当成当地实际发生的事件。因为对当地人来说，这些口传故事解释了为什么与特定的村落不可以通婚；为什么从某一场所挖出了大量的人骨；为什么存在着被称为“地窖”的隐蔽的家；为什么在周围形成了操甘肃、湖北口音的人的村落等等日常生活中的疑问。

同时，这里所描述的老百姓的日常世界，除了马长寿、梁澄清等人的调查活动之外，没有与学术界、文字资料等所谓的制度模型间的交流；与 Master Narrative 也没发生过交往和互动。因此，可以说这些民间故事没有随着文字资料的记述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没有形成作为事件史的长篇故事，而仅仅是与具体的景观、事物相联结，作为个别的口承故事被流传下来。

此外，这些事例也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反思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契机。具体来说，在各个时代的各种势力较量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是通过文字化这一特殊的过程，将总体的现实的一部分作为事实被记录下来，而因此成为所谓的贵重的资料的。笔者认为，严格地说这种作业过程其实都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某特定部分的取舍。尽管人们对史料进行严谨的甄别，而成为史料的资料其实往往是在某种积极意图下被文字化的东西、或者是偶发性的记录。在其背后通常都有着膨大的“失语”的现实状况没有被提及。在考察历史时，依据有关文字资料原本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近年来，阅览文字资料变得更为容易，这也带来了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不过，也正是因为身处这样的时期，更有必要思索这些文字资料自身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及其界限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需要探索既重视与历史资料的关系，同时追求与历史学的资料操作方式不一样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记忆。换句话说，人类学需要保持与历史学者们的对话，但是人类学的立场不仅仅是补充没有文字史料的领域，我们也要从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及其内涵来分析过去的现象。无须赘言，当地人的记忆与文献史料同样，是经过个人的选择，没有保留完整的体系。但是这些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记忆并非是被分散的历史片段，它们在人们整理、解释自己的生活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被叙述，赋予了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以意义和逻辑。

表1 叙述的社会空间（引自：桜井：2010:489）

事件的选择· 配列的模式	多重涵义和经验的领域	空间概念	叙述的样式 (桜井)
制度模型	政治、统治、党、选举领域、国民的·国际的历史背景、 政治思想	国民国家和世界	Master Narrative
集体模型	社区、邻居、工作场所、罢工、自然灾害、礼仪、参与“制 度模型”活动集体	村、近邻、工作 单位	Model Story
个人模型	私人的·家庭生活、出生、死亡的生命循环、其他两种 层次的个人参与	家庭	对经验的叙述

本图是笔者根据 Portelli (1991) 和桜井 (2002) 的著作和论文整理而成。

本论文是基于笔者在当年发生了回民起义的地区收集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该地区在清军镇压了回民军后，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回民移住的情况。因此，提供这些口承故事的基本上是当时汉族人的后代。这一调查方法不可避免地出现偏重于当事者某一方的言论的现象，在此笔者谨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本论文的限制性。

※ 本研究受到“福武学术文化振兴财团”的课题援助（2006年），在此对该财团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和鼓励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中文）

白寿彝（编）

1953 《回民起义》三卷，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神州国光社。

1992（1951）“回回民族的新生”《白寿彝民族宗教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辰村史编纂委员会（编）

2010 《北辰村史》西安：北辰村史编纂委员会。

高家堡村史编纂委员会（编）

2010 《高家堡村史》西安：高家堡村史编纂委员会。

观音庙村史编纂委员会（编）

2011 《观音庙村史》西安：观音庙村史编纂委员会。

党晴梵

1931 “陕西文化的过去与未来”《西北研究》第二期，西北研究所。

杜建国

2000 《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史稿》西安：中央西安市委党校印刷厂。

樊圃

1956 《西北的少数民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范文澜

1953（1947）《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北京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冯葆光

- 1964 “三原基督教的由来”《陕西文史资料》1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韩敏

- 2006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华源实业调查团(编)

- 1933 《陕西长安县草滩、泾河县永乐店农垦调查报告》苏州:华源事业团发行。

梁澄清(主编)

- 1989 《咸阳民间故事集成》2卷,咸阳,咸阳市文化局·咸阳市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林幹

- 1957 《清代回民起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刘安国(修)

- 1932(1986)《重修咸阳县志》咸阳:铅印本。

马长寿(编)

- 1993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纪录》西北大学历史系民族研究室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原稿形成在1956-1957)。

秦晖、苏文

- 1996 “羌笛声中杨柳怨”《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秦晖

- 1999 “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耕耘者言》”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一期)。

- 2001 “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

邵宏谟、韩敏

- 1980 “同治初年陕西的回民起义”,《陕西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 1987 《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92 《陕西回民起义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佚名

- 1907 《咸阳乡土志》(稿本)。

宋伯鲁(等修)、吴廷锡(等纂)

- 1934[1990]《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通志馆,《《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一辑第6~11卷,兰州古籍书店)。

田培栋

- 2000 《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廷珪、张元际等(编)。

- 1923 《重修兴平县志》8卷,西安:西安艺林印书社。

咸阳市民政局·咸阳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编)

- 1996 《咸阳市民族·宗教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咸阳市地名工作办公室(编)

- 1987 《咸阳市地名志》咸阳:咸阳市地名工作办公室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0 《咸阳市志》第4卷，西安：三秦出版社。

咸阳市民政局·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

1993 《咸阳市民政志》咸阳：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编）

1994（1947-1949中断）“咸阳县志”稿本《泾渭稽古》总第5期，咸阳，《泾渭稽古》出版部、张世民（编）

咸阳市渭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委员会（编）

1996 《咸阳市渭城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张寄仙（编）

1936 《陕西省保甲史》长安：县政府保甲研究社。

张元际（编）

1907 [1969] 《兴平县乡土志》6卷，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张中复

2007 《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日文）

安藤潤一郎

2002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の雲南省西部における漢回対立—「雲南回民起義」の背景に関する一考察（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云南省西部汉回对立—“云南回民起义”背景的考察）」、『史学雑誌』第111編第8号、東京：東京大学文学部内史学会。

中国民衆史研究会（編）

1983 「第1号後記」『老百姓の世界—中国民衆史ノート—（老百姓の世界—中国民众史备忘录—）』第1号、東京：研文出版。

1989 「編集後記」『老百姓の世界—中国民衆史ノート—（老百姓の世界—中国民众史备忘录—）』第6号、東京：研文出版。

岩本通弥

2003 「総論：方法としての記憶（总论：记忆做方法）」、『記憶』（現代民俗誌の地平3）岩本通弥（編）東京：朝倉書店。

中田吉信

1959 「同治年間の陝甘の回乱について（关于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近代中国研究』第二輯，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3 「中国における回族問題（中国的回族问题）」、『就実論叢—社会篇』No. 22、岡山：就実女子大学。

並木頼寿

1994 [2010] 「中国の統合と毛沢東（中国的统合与毛泽东）」、『東アジアに「近代」を問う』（並木頼寿著作選I），東京、研文出版（初出『現代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統合と再編に関する比較現代史研究』1993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B）研究成果報告書）。

桜井厚

2010 「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の時間と空間（口述故事的时间和空间）」、『社会学評論』vol. 60, No. 4、東京：日本社会学会。

シンジルト（Shinjilt）

2003 『民族の語り—中国青海省モンゴル族の日常・紛争・教育（民族的话语语法—中国青海省蒙古族的日常・纠纷・教育）』東京：風響社。

田村和彦

- 2007 「歴史記憶をめぐって—西北「回民起義」に関する語り（关于“历史记忆”—西北“回民起义”有关的话语为例）、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編）『漢族・少数民族研究の接合：クロスオーバー的視点からみる漢族と少数民族の社会と文化』、84-105、愛知：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

山本英史

- 1998 「中国の地方志と民衆史（中国的地方志和民众史）」『中国民衆史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歴史篇』、神奈川大学中国語学科（編）東京：東方書店。

楊海英

- 2002 「十九世紀モンゴル史における「回民反乱」—歴史の書き方と「生き方の歴史」のあいだ—（十九世紀蒙古史の“回民反乱”—历史的写法与“生活的历史”之间—）」『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別冊報告』Vol. 26、No 3、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英文）

Foster, G. M.

- 1965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7.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ssociation.

Jenkins, K.

- 1991 [2003]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isztal, B.

- 2003 *Theories of Social Remembering*,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Portelli, A.

- 1991 *The Death of Luigi Tran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注

- 1) 这里作为比较对象的地方志，根据出版年代列举如下：1949年以前的有《兴平县乡土志》6卷（1907）、《咸阳乡土志》（1907）、《重修兴平县志》8卷（1923）、《重修咸阳县志》（1932）、《续修陕西通志稿》（1934）、《涇渭稽古》（从1947年开始编纂1949年解放前夕停止，1994年一部分出版）。1949年以后的地方志有《咸阳市地名志》（1987）、《咸阳市民政志》（1993）《咸阳市民族・宗教志》（1996）、《咸阳市渭城区志》（1996）、《咸阳市志》第4卷（2000）。另外，有关当地回民起义情况的说明参照了邵宏谟、韩敏的文章（邵、韩：1980、1987、1992）、《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韩：2006）和《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史稿》（杜：2000）。
- 2) 历史专家、中国史学会的这些理解结构全面改变了（学者用语上的）历史观，如《西北的少数民族》（樊：1956）、《清代回民起义》（林：1957）等，目前它成了说明“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白：1992（1951））回族的重要一部分。对于这一史观，张中复从族群的角度已经详细地分析了其形成过程，但是由于资料的原因，他没对口述资料进行分析（张：2007）。

另外，有关云南回民起义的考察，日本历史学者安藤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他的特点在于分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纠纷如何最终被归结为“汉回对立”的过程，提出了“民族”“对立”形成背景的假定模型（安藤：2002）。虽然他是以地方志资料为基础进行的分析，但是与笔者从口述资料进行的分析

结果有相通之处。

- 3) 日本曾经发行过名为《老百姓的世界》的刊物(1983-1991)。以学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的学者们为主体,成立了“中国民众史研究会”。该研究会的目标之一是打破随着日本学界的中国历史学科的专业化,学科越来越闭锁的状况,加强与学科外的学者间的交流(第1号后记)。编辑人在第6号后记中提出对文献资料和老百姓的世界间存在着距离,对史料被制造的过程提出怀疑。我们今天的学者有必要继承他们对史料既有着极为认真、谨慎的态度,同时保持怀疑、批判意识的这一做法。
- 4) 例如《高家堡村史》(高家堡村史编纂委员会:2010)、《北辰村史》(北辰村史编纂委员会:2010)、《观音庙村史》(观音庙村史编纂委员会:2011)等。然而,这些现在编写的村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县志一样,也有着一定的样式(山本:1998)。可以看出存在着对有关记事和照片的转引、借用。同时,在民间经常听到的有关左宗棠的逸事基本上没有记述。相反,对宋景诗等人的记述却很为详细。从诸如此类的事实来看,那些有关当地人消息的记述,很难说其完全来自下层,或是完全从当地人中收集上来的。有意思的是有关村落中的家谱、历代干部、近年来的村落变化等的记述详尽而生动。但是作为记录地方的实际情况的资料来说,无法对其作过高度评价。
- 5) 笔者在本论文中按照人类学研究的通例,除了特别的需要外,将相关的人名匿名化。所例举的口承故事也都是这一地域广为周知的内容。采用的是从复数人那里都可以听到的内容,因此,归结成了比较典型性的口承故事。
- 6) 这样的历史的应有形式,在同样的有关回民起义为题材的研究中,被称为《活着的历史》,与文字记录下来历史进行了对照(杨:2002)。
- 7) 笔者对这些民间口承故事的收集,是从2000年至2005年在关中平原的几个县—泾阳、兴平、咸阳、高陵、蒲城进行的。在这里介绍的事例主要来自明嘉靖年间曾开设经堂的胡登州等人的推动下回民教育曾经极为兴盛,同时回民起义期间设立了“渭城府”的这一地区的周边农村。另外,该地区受到了从咸丰十一年(1816)至同治二年(1863)年的回民起义的直接影响。
- 8) 例如《陕西省保甲史》中在介绍这一地区的村落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筑防堡、挖地道的自卫手段时,引用了《续陕西通志》富平县的记述:“考回乱之起,乡民猝不及防,临时多避地窖,近深沟者,或凿高窑,北山则依石洞以藏身”。此外,还介绍了回军唱的歌词:“当时贼有谣曰,老鸦巢,用竿戳,地老鼠,怪难捉”。梁澄清主编的当地口述集是在方法上对“口述者”、“收集整理者”、“收集时间、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记录,比起一般的故事集是更为有力的资料,而内容上(虽然有关回民起义的内容有所顾虑,有着不从正面作描写的方针)也非常丰富(梁:1989)。在有关风水师的故事中,“金田玉(地名:笔者注)的老鸦窝好躲,大堡子(地名:笔者注)的地老鼠难捉”的记录与现在在当地农村可以听到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语句。
- 9) 回民起义荒废了许多汉人村落,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又出现了无人化的回民村落。因此,当时陕西巡抚刘果敏曾积极推进鼓励甘肃省庆阳等地的居民移民过来。其结果在当地出现了多个来自甘肃、山东、湖北等地的外来人村落。
- 10) 不过,笔者认为,Foster所构想的有关结构稳定的农民社会 peasant society 模式和原本流动性比较强的解放前的关中地区的农民社会有一定的差别。这一点在笔者打算在其他文章中进一步讨论。